

会员专供 注意保存

风景工作参考

主办单位：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总第188期)

本 期 要 目

- 雷峰塔遗址：别再砸钱给我了
- 世遗大会呼吁：为世界遗产提供最佳保护
- 国内大部分景点游客重游率不足1%
- “共享旅行”来了
- 游客并非多多益善
- 大堡礁幸免“世界濒危遗产”
- 战后重生的卢旺达国家公园

2017年7月15日

(所载内容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目 录

热点关注

雷峰塔遗址：别再砸钱给我了	-----3
世遗大会呼吁：为世界遗产提供最佳保护	-----7
对中国的世界遗产来说，旅游开发是最大威胁	-----10

新闻摘要

国内大部分景点游客重游率不足1%	-----13
云南立法保护澄江化石地	-----17
龙门石窟成全国首个“无现金景区”	-----18

社会纵横

“共享旅行”来了	-----20
----------	---------

时事评论

游客并非多多益善	-----22
乡村游经济，应让村民唱主角	-----24

世界遗产

大堡礁幸免“世界濒危遗产”	-----26
世界遗产申报谁说了算	-----27

环球博览

战后重生的卢旺达国家公园	-----30
马丘比丘推行限时游览	-----31

雷峰塔遗址：别再砸钱给我了

【钱江晚报2017年7月13日】此前，有老人在上海浦东机场坐飞机时，往飞机发动机里扔钱，导致航班延误，并引发了争议。其实，一些人的扔钱已成习惯，一言不合就扔钱，从故宫的荷花池里，扔到各地自然博物馆的恐龙化石边上。

在杭州，雷峰塔的遗址，就因为很多人扔钱，而成了一个钱山。

日前，钱报记者来到雷峰塔景区一探究竟，作为省级文保单位的雷峰塔遗址，正经历着被“砸钱”的烦恼。

硬币扔到玻璃上叮叮当当

钱报记者来到南山路上的雷峰塔景区。不是周末，天气也很热，但是这里依然游客如织。雷峰塔景区里的电梯排起了很长的队伍，很是热闹。

一楼走进去，就是雷峰塔遗址。

记者看到，这里被四面玻璃幕墙围着，里面是已经挖掘过的雷峰塔和地宫的遗址，保持着当年挖掘后的原貌，高出地面近3米，上面是或倒或塌的砖墙。玻璃幕墙外面围满了游客。“看啊看啊，好多钱！”时不时响起孩子的大喊。

透过玻璃幕墙，钱报记者看到，遗址几乎被满满一层硬币和纸币铺满了，灯光下硬币闪烁着反光，看着还真像钱山。里头的钱以一元硬币为主，还有不少纸币，大多是一元的，其他10元20元的也不少。除了靠近玻璃幕墙的地方，远一点的遗址砖墙上，也有不少硬币，看得出来是花了力气扔过去的。

这里的玻璃围墙高2米左右，比成年人要高，不过没有全部封住，上方留有空间。记者发现，不少游客熟练地掏出钱包，摸出几枚硬币，刷一下，扬起胳膊就扔了进去。

有些没扔好，硬币撞到了玻璃上，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有的小孩子追着掉在地上滚动的硬币满展厅跑，场面多少有些混乱。

现场的景区保安皱着眉头看看，似乎想上前阻止，却又把脸别了过去。钱报记者问他怎么不管，他说没辙，没法管。不过他表示，景区会定期清理。“上千年的东西，这么每天扔钱，我想想应该也不好的。”

这个遗址分一二层，在二层可以俯视整个遗址，在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里头钱不少。

在遗址上，一块写着“浙江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安静地立在那里，边上有不少硬币。而就在玻璃幕墙上，贴着很醒目的“保护遗址 请勿抛物”警示标语，一眼就能看到，但似乎没啥作用。同时，在玻璃幕墙上方，则有显示屏滚动播放着当年挖掘保护雷峰塔地宫的纪录片，不过没人看，大家都忙着扔钱。

我支付宝转你，换几个硬币

钱报记者在展厅里观察了大概半个小时，遗址前的游客几乎没有中断过，其中近一半的人会扔钱，粗略一数，就有好几十人了。

记者看到，扔钱的主要是中年妇女、小孩还有年轻的情侣。

带着孩子的父母大多会掏出硬币给孩子，然后说，拿着，扔！使劲！

有男生掏出硬币给身边的女朋友，笑着说，先许个愿再扔。

一些中年妇女动作就快多了，翻包，拿钱，扔——动作流畅，一气呵成。记者问一位刚扔了钱心满意足离开的女士，“这里好像不能扔钱啊？”她很奇怪地看了记者一眼，“谁说的，这么多人在扔，来了嘛就要扔钱的。”

有意思的是，有人没带硬币，就问边上的人，我没带钱，支付宝转你，换几个硬币。很快，掏出手机一扫，转了账换了钱就扔，看着倒也真是方便。也有扔钱的游客准备扔的时候，发现记者在看，就很不好意思地把手放下了。看来，不少人还是知道其实这里是不能扔钱的。

景区工作人员无奈：真没办法

遗址是文保单位，每天这么扔硬币肯定会有影响，难道真没人管吗？

钱报记者找到负责雷峰塔景区管理的杭州雷峰塔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景区分公司。在景区游客中心，记者找到一位负责人，她一听这事就皱眉，“扔钱的是很多，我们也管，你看，现场贴了警示标语，也安排了巡逻保安，以前也阻止过，但是没什么效果，有些游客说别人好扔，我为什么不好

扔，确实很难管理。”

她告诉记者，扔钱这事，从雷峰塔重建开放之后就有了，屡禁不止。

记者了解到，雷峰塔重建是从1999年开始的，2001年3月，为配合重建，对遗址和地宫进行了发掘并出土了一批精美文物。2002年11月，在原址上重建的雷峰塔正式对外开放。

据了解，目前景区对遗址的钱币每个月不定期清理一到两次，旺季的时候次数多一些。一年下来大约能清理出两万多元。这些钱被用于雷峰塔的日常维护。

说起这件事，景区很头疼。那位负责人说，“我们确实没招了，也不好硬来，你们有什么办法吗，有办法的话告诉我们。”

杭州市历史学会副会长仲向平曾对此表示，“从民俗角度讲，在一些景区扔钱币可能象征着祈福、求平安的意思，老百姓扔钱币的出发点可以理解，但这种行为很容易损坏文物，也会给工作人员带来长期的清理负担，应该制止。其实，现在很多景区有专门扔钱币的地方，也不涉及文物保护，老百姓可以选择那些地方扔，放过真正的文物吧。”

扔钱并非国人专利

中国人喜欢在景区扔钱是出了名的，在国内，除了特定场所，其他类似动物园、博物馆甚至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都有人扔钱。此前有媒体报道，一些自然博物馆恐龙化石的脚下都扔满了钱。网友调侃，这扔钱是为了让恐龙保佑你不要骨质疏松吗。

扔钱祈福的历史，在中国由来已久。

有媒体称，只要有炉子、池子、坑这些设施，我们就会扔钱，扔钱的背后，是一种带有仪式感的交易式信仰。

其实早在唐代，就有扔钱的记载，唐代笔记小说《朝野僉载》里记载：当时的并州有一个妬(妒)女泉，澄澈千尺，“祭者投钱，皎然皆见”。说白了，就是往泉水里扔钱。

也有论者认为，国人喜欢扔钱也和国外许愿池有关。其中最有名的就是意大利罗马的特雷维喷泉，也叫幸福喷泉，建于1762年。

据说，背对许愿池抛3枚硬币，能找到恋人。而上世纪50年代，美国影片《罗马假日》中，奥黛丽·赫本在许愿池扔硬币的桥段，让扔钱一时间成

为风尚。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2016年抛入这个许愿池的硬币总值140万欧元（约合1027万元人民币），这笔钱最终被用于慈善。

扔硬币祈福在全世界都有类似的风俗。比如泰国人相信将硬币丢到海龟身上能够让自己长寿并带来好运。央视就曾报道泰国有海龟吞了5公斤硬币最终死亡的新闻。而印度人则喜欢在石头上放硬币。

实际上，近些年，景区扔钱似乎更像一种游戏，难度越高越受欢迎，以致于各种千奇百怪的地方都被扔满了钱。加上国人多少有从众心理，一看边上人都扔了，我不扔好像说不过去，于是一人扔，百人扔。网友就说，世上本没有许愿池，扔钱的人多了，就成了许愿池。

新华社曾就此评论，一些博物馆和景区，对扔钱行为疏于管理，游客扔下的钱也没有及时清理，以致于游客认为这是默许的，所以加剧了扔钱行为。

除了明确用于扔钱祈福的地方，在其他景区场所尤其是文物上扔钱的行为，并不文明。而跑到国外也到处扔钱，以致于日本不少景区不得不用中文写出“不得扔钱违者重罚”的警示语，这样的事情，则有些丢人了。

向景点文物“砸钱”之风，真的没法治吗？

近些年，向景区“砸钱”这种“特色”祈福行为屡见不鲜。越来越多的景区古迹变成了“功德箱”、“许愿池”，文物们被迫住进了“金山银山”。趵突泉的泉眼变“钱眼”、青海塔尔寺内石头变成“纸币墙”、甚至博物馆内的恐龙化石展柜也未能幸免……胡乱扔钱导致环境破坏和文物损毁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中国，扔钱祈福的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唐代笔记小说《朝野僉载》里，就记载有当时的人们喜欢往泉水里扔钱之举。人们为什么热衷于向景区的文物区“砸钱”？许愿祈福者有之，传承习俗者有之，从众跟风者亦有之。前两者的出发点无可厚非，我们不能排除一部分扔钱者确实把文物当成“圣物”，有着虔诚且强烈的精神寄托。尊重每个人的信仰是现代社会应有的包容，但是文明祈福和文物保护意识必须是最基本的前提。扔钱祈福，不但容易损坏文物，也会给工作人员带来长期的清理负担；相比之下，有着游戏心理的从众跟风者之举则令人痛恨，不但有悖景区开放参观的初衷，也有悖于文明旅游的理念。而且，如此随意投掷钱币，更有对人民币不够尊重之

嫌。

规范文明祈福、合理掷币的行为，观念意识的转变才是关键，人们应当在保护文物和景区环境的前提下图吉利、求平安。试想，如果所扔硬币不幸损坏了文物，结果不正好与所祈之福相反吗？前不久，闹得沸沸扬扬的“老太太朝飞机发动机里投硬币祈福”事件或许正说明了这一点。很多人嘲笑老人迷信、不懂常识和法律，其实那些随意向文物扔钱的人与这位老人的行为在本质上又有何区别？

从法律层面讲，我国对景区和文物保护有着严格的法律规定。例如，《风景名胜区条例》第四十四条规定，刻划、涂污或者以其他方式故意损坏国家保护的文物、名胜古迹的，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目前，我国绝大多数景区对扔钱祈福行为多持“不鼓励，不禁止”态度，个中缘由，显而易见——狂热的扔钱者客观上的确为景区带来一些收益，但这些与维修文物的高额成本相比，恐怕得不偿失。

那么，针对任性“砸钱”的行为真的无计可施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观念的转变并非一朝一夕，需要制度和措施及时跟进。景区不妨设置专门的扔钱祈福地点，宣传引导游客文明祈福，同时对随意“砸钱”行为予以重责重罚；国家也应尽快完善相关法规，让景区不再“头疼”，文物不再“挨砸”。而把钱投进募捐箱帮助真正有困难的人，恐怕也要比“砸钱”图吉利有意义得多，相信也会带来更多福报。

（记者：王曦煜 评论员：刘丹）

世遗大会呼吁：为世界遗产提供最佳保护

【人民日报2017年7月14日】当地时间7月12日，第四十一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世界遗产大会）在波兰历史文化名城克拉科夫闭幕，本届大会共有来自137个国家的约3000名代表参加，审议通过了21处新的世界遗产地。出席本届大会的代表呼吁，加强对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和修复，提升人们的社会责任和保护意识，为世界遗产提供最佳保护。

世界遗产地总数已达1073处

本届大会对35项世界遗产申请进行了审议，其中包括文化遗产27项，自然遗产7项，自然和文化双重遗产1项。经过投票表决，21项申请获得批准，入选《世界遗产名录》。其中包括中国青海省可可西里和福建省鼓浪屿。截至目前，世界遗产地总数达1073处，包括814处文化遗产、224处自然遗产以及35处自然与文化双遗产，遍布世界167个国家。

本届世界遗产大会还审议了18项已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遗产的保护状况和30项已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遗产的保护状况，并对处于战火中的叙利亚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状况议题进行了审议。

奥地利的维也纳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原因是新型房地产的出现掩盖了老城原有的景观，亟待采取保护措施。《世界遗产名录》在册的1073处世界遗产中，目前有55处属于濒危遗产。

本届大会主席、克拉科夫国际文化中心创始人雅采克·普尔赫拉在闭幕式上说，大会通过的235项决议，将有助于落实《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他呼吁与会代表尊重公约，尽力完成使命，为在列的世界遗产提供最佳保护。与会的各国代表也一致认为，需要加强对文化与自然遗产的保护和修复，这对人类文明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遗产保护工作成就卓越

中国青海的可可西里和福建鼓浪屿在本届大会上申遗成功，使得中国拥有世界遗产数达到52处，处于世界领先地位。此外，武夷山边界调整项目也获得大会审议通过，1999年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地武夷山的范围扩大到江西铅山，这进一步加强了武夷山自然价值的完整性，同时更进一步推动对该遗产地的保护工作。

今年是中国首批世界文化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30周年。出席本届世界遗产大会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博科娃肯定了中国在遗产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她说，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是文化遗产保护的积极支持者。中国的遗产保护工作与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也得益于民间自然文化遗产意识的觉醒。

比如，可可西里的藏羚羊曾一度遭到猎杀。1997年，中国政府设置了第一个藏羚羊保护区。得益于中国政府、社会力量以及民间环保组织的共同努力，如今藏羚羊已不再是濒危物种。

博科娃还特意向采访此次会议的中国记者提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年5月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上，再一次强调了遗产保护工作的重要性，这令她印象深刻。博科娃说，2014年，习近平主席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进行了历史性访问，足见中国对遗产保护、文化交流等方面的高度重视。

普尔赫拉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在遗产保护方面表现卓越。“回想起我的中国之行，最难忘的是西安兵马俑，它不仅象征中国悠久的历史，也象征着中国在遗产保护方面的成就。”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中心非洲部主任埃德蒙德·穆卡拉也表示，“一带一路”倡议也与世界遗产有着紧密联系。他认为，“一带一路”促进了国与国之间的文化、科技交流，也必然带动沿线国家的遗产保护工作。

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相辅相成

“当今世界的遗产保护，监管体系的工作理念需要跟上时代，立足过去，构筑未来。”普尔赫拉在世界遗产大会开幕式上的这番话，道破了世界遗产保护和人类自身发展的辩证关系。

他认为，大自然的恩赐和祖先的财产，具有突出和普遍的人文、自然价值，我们只能通过保护，让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得以传承，让自然生态保持良性循环。我们不能以发展经济为借口，过度开发甚至破坏历史长河留下的珍宝。普尔赫拉还这样比喻：“遗产保护与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亲生兄弟，相辅相成。”

世界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罗斯勒在大会发言时指出，“遗产保护方要对整个地区、当地社会、国际社会以及人类后代负责任。”他强调，对于已列入名录的遗产，最大挑战是，如何在瞬息万变的社会发展中，维持遗产本身的独特性和本来的样貌。遗产保护者应该有一种使命感，能够对抗外界经济、政治、战乱等不稳定因素；同时，也要运用所具备的专业知识，向大众普及自然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性，形成全民共识。

出席本届大会的代表还对《世界遗产名录》中的55处世界濒危遗产进行了讨论。他们认为，以前，军事冲突、政局动荡是这些遗产处于濒危状态的主要原因。而如今，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起到了一定的副作用。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代表表示，“遗产的保护总是在与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处于下

风”。芬兰代表也指出，“如果人类不齐心协力扼制气候变化，那外界环境的恶化，就会对自然遗产产生恶性后果，甚至文化遗产也在所难免”。

会议期间，专家们援引了伯利兹珊瑚礁由于过度捕鱼和无节制海洋排污而濒临灭绝的例子。英国的利物浦海上商城则是由于过度商业化、现代化，破坏了城市原有的结构，被列入濒危遗产名单。如何保护这些文化与自然瑰宝，将是各国未来需要面对的重要任务。

（记者：李增伟）

对中国的世界遗产来说，旅游开发是最大威胁

【腾讯网2017年7月9日】尽管中国世界遗产数量位居前列，但很多地方的遗产保护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为什么地方政府热衷申遗，却没有按照规定好好保护？

中国申遗大队都排到几十年后了

1972年11月1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第十七次大会上正式通过了《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1976年成立了世界遗产委员会，并于1978年确定了首批12处世界遗产，并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而中国，则是在1985年成为《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缔约国。尽管加入时间晚，但中国的世界遗产数量增长很快。加上刚刚列入名录的可可西里和鼓浪屿，共有世界遗产52项，包括文化遗产31项、自然遗产12项、文化自然遗产4项及文化景观5项。

除此之外，在《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上，还有27项文化遗产、16项自然遗产、16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共计59项等待申报。根据2004年世界遗产大会公布的“苏州决议”，一国可以提交两项预备世界遗产，但至少必须有一项是自然遗产。算下来，中国的申遗大队已经排到30年后了。

而申遗也是条漫长的路，这一申请过程，开平碉楼走了7年，中国丹霞4年，五台山10年，中国南方喀斯特更是漫漫12年。而在《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海南东寨港自然保护区、江西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以及安徽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都是在1996年就列入名单，至今仍未成功申遗。

地方政府砸锅卖铁也要申遗

尽管申遗的难度很大，并且希望渺茫，但还是挡不住这些年的申遗热潮。在最初，这种申遗冲动源于中国人希望得到世界的认可。但是随着丽江、张家界等地在申遗之后成功地开发旅游，地方政府不仅将世界遗产当作是一棵摇钱树，还是重要的政绩。

比如，自从1997年12月成功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以来，山西平遥古城的游客量已从当年的5万人增长到2012年的417万人，门票收入由当年的125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1.5亿元，旅游综合收入也由当年的1200万元增长到2012年的80亿元。无独有偶，洛阳龙门石窟申报前每年门票收入1000万元，申遗成功后第二年就高达2700万元。

门票只是最直接的经济回报，宾馆、酒店、娱乐场所等各色服务设施可以带来进一步深层消费，《世界遗产名录》迅速成为一个暴利行业的准入证。于是，很多地方就算是砸锅卖铁也要申遗。

2007年6月27日，由云南石林、贵州荔波和重庆武隆捆绑申报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项目，成为中国第六个世界自然遗产地。为确保申遗成功，吃“财政饭”的贵州省荔波县政府因此背负了2亿多元高额债务。

但是也有人不认可申遗成功势必带动当地经济的说法，中山大学城市与区域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张朝枝的一份课题研究就指出：“实际上从全世界看来，申报遗产成功之后，旅游业随之增长的只有40%不到，大部分是申报成功后跟旅游没什么关系，比如，周口店北京人遗址、高句丽王朝，都是世界遗产，但几乎没什么人去。”

地方政府热衷申遗除了经济回报还有政绩考量。2012年，陕西投入上百亿元修复未央宫遗址，推动丝绸之路申遗。陕西省文物局一位官员在接受《中国经营报》采访时说：“陕西的世界文化遗产只有1处，众多的文物古迹都没有入选，这与陕西作为历史文化大省的地位非常不符。‘丝绸之路’申遗将使陕西的世界文化遗产景点数量大幅增加。”

对中国的世界遗产来说，旅游开发是最大的威胁

对世界遗产进行过度的旅游开发，与遗产的保护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在联合国世界遗产公约里，基本就是“保护保护再保护”，对景区是否保护得当也是能否入选的条件，一切以“保护为本”。但在很多地方，地方政府似

乎只看中了“世界遗产”背后的知名度与经济效益，但忘了同时也要按照国际规定的要求来开展保护。

由于申遗前期投入巨大，很多地方一旦申遗成功，便会迫不及待地捞回成本，盲目开发，导致保护区内乱象频生。

同济大学教授阮仪三就曾说过：“我保护了平遥、丽江、周庄，但之后这些地方就成为了兴旺的旅游景点，这可喜也很可悲。”比如丽江古城，盲目地将原住的纳西族人口迁出来，过分进行商业开发，使世界遗产本身的真实性变“味”了。在2007年，包括丽江古城在内的6处中国世界遗产被“黄牌警告”。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庐山申报世界遗产时，联合国专家来检查他们就把索道拆掉，入了遗产后马上又建起。”已有六百年历史的平遥古城墙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接连三次坍塌，日益增多的游客是造成古城墙难以承受之重的主要原因。而被视为“中华瑰宝”的敦煌莫高窟壁画，因旅游人数倍增，加速了壁画氧化。

世界遗产不该是摇钱树，为了保护可能是亏钱的

地方政府不要把申遗当作是对旅游开发的前期投资，申遗还是应该不忘初心，它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后代看护大自然的恩赐和祖先的财产，而不是为了商业开发。这次可可西里申遗，就明确是为了保护而非发展旅游，是在青藏高原上为藏羚羊保住家园。

而且，如果按照规定严格保护世界遗产，并限制商业开发，申遗很可能是一项“亏本”的买卖。2008年，英国就曾宣布暂停申遗，这与当时工党的执政理念有关，也与当时英国面临较大的财政压力不无关系。普华永道撰写的报告显示：英国申请一个世界遗产需要花费40万英镑，平均每年用于维护的花销也在15万英镑左右。而世界遗产地位给旅游业带来的收益被夸大了，因为只有很少一部分游客意识到这种地位或者是被这种地位所吸引才来参观游览的。

而申遗又是一座十分难走的独木桥，所以在日本，有人就觉得与其花钱申遗，不如把这钱花在文物保护上。日本山形县的最上川是旅游胜地，山形县此前打算申请最上川为世界遗产，但吉村荣美子在2009年出任山形县知事后立刻宣布放弃申遗。她说：“申遗需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这笔投资就像一

个无底洞，还不如踏踏实实把这些钱用在遗产保护上。”

申遗不是奥运会，遗产数量是不是第一并不重要

伴随着这些年的申遗热，从2003年开始，中国已经连续15年有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随着可可西里和鼓浪屿申遗成功，中国的世界遗产总数继续名列世界第二。不过，世界遗产早已过了拼数量的时代。

据《世界遗产》杂志的报道，2003到2013年，金砖国家在世界遗产委员会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印度、中国、南非、俄罗斯都做了7年的委员国，巴西做了4年。其中申报遗产最积极的是中国，申报了17项，高于印度的12项。中国每次大会的阵容也最为庞大，平均为29人，遥遥领先于其他代表团，位列其后的南非和俄罗斯为20人。

但是，在正式大会上就申报议题发言的次数上，印度最多，平均每届22.6次，中国是12.4次，仅比南非的11.1次高。中国申报成功的遗产数量最多，兴师动众来的人数最多，发言次数却非常少，对大会事务并不积极介入。给其他国家的观感就是：只追求数量，而不参与国际遗产事务。

其实，申遗不是奥运会，第一还是第二并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如何保存好人类文明的硕果。当下，经济全球化正在将全球融为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各国所拥有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会因地域、贫富、种族的差别而将它割裂，保护历史财富的目标是一致的。

如果承载着这些历史信息的载体消亡了，依附于其上的人类文明也会消失。正如著名的美国文化遗产保护运动机构——美国国家历史保护基金会所尊崇的信条那样：“保护那些不可替代的。”

（魏巍）

新闻摘要

国内大部分景点游客重游率不足1%

【新京报2017年6月28日】近日举办的“第二届中国目的地旅游与国民

形象论坛”上，传奇文化发展集团董事长陈宗冰指出，经过他的实地调查发现，国内大部分的旅游景点重游率不足1%，作为衡量景点运营的重要指标之一，重游率越来越受到行业的重视，如何在做好初次到访率的基础上争取最大限度地提高重游率，已经成为摆在景区景点面前的现实问题。

国内景区的重游率不容乐观

从可以查询到的研究数据看，不同的研究者和研究机构对重游率的统计数据有一定出入，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目前国内景区的重游率普遍不容乐观。著名旅游学者、暨南大学旅游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董观志教授做的一项关于重游率的调查显示，日本东京的迪士尼乐园重游率甚至高达83.6%，而我国的景区重游率最高的是28.3%。

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报告则显示，在旅游业发达国家，主题公园及其他旅游景点的重游率均在70%以上，如美国、法国。在中国，旅游资源独特、休闲度假设施完备的地方，重游率也较高，如云、贵、川等地。众多主题公园如深圳欢乐谷等，更是把重游率视为“生命线”。

在旅游业中，游客重游原因一般有三点，一是初次旅游印象不错而且当地推出了新产品；二是商务活动或者聚会；三是休闲度假。一个旅游目的地的旅游资源是否独特、旅游产品是否成熟、旅游产业链是否完善、旅游服务是否优质以及旅游项目是否能够时常推陈出新等因素，共同决定着旅游目的地的重游率。

休闲游与观光游最大区别在于重游率

“休闲旅游的载体经济与观光旅游的要素经济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重游率”，董观志指出，观光旅游是看稀奇古怪的事物和现象，名气越大，前往观光的旅游者就越多。要素经济的旅游业就是为了满足这类旅游者的旅游需求，这类旅游需求有一个难以超越的门槛，这个门槛就是重游率比较低。所以，几十年来，不仅我国旅游主管部门，而且世界旅游组织，在公布旅游业统计数据时，主要公布两个指标：接待过夜游客人次和旅游总收入。这两个指标意味着什么？

直截了当地讲，就是经济学上的规模。对于品牌知名度比较小的旅游目的地，游客重游率一般也是比较小的，要想通过一次性到访的游客接待量做大旅游业规模，是有很难度的，甚至是一个难以跨越的门槛。这就是休闲

旅游脱颖而出的根本原因。

前瞻产业研究院的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大部分主题公园尤其是自然生态型、文化历史型等传统的主题公园重游率均较低；只有少数游客参与性较强、产品创新较快的景区如深圳欢乐谷、东部华侨城等重游率较高。另外，近两年越来越多的主题公园通过产品转型而使重游率有所提高，如河南的清明上河园，实现了由观光型旅游产品向娱乐休闲型度假产品的转变后，该公园重游率有明显提升。

找准定位，杀出“门票经济”红海

北京的天坛、扬州的瘦西湖是国内较为典型的重游率较高的景区，而这两个景区也是收门票。在过去，不论是天坛、还是瘦西湖，都可以看作是观光目的地，而近年来，这两个景区也同时成为了人们喜欢的休闲、健身场所。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教授魏翔博士认为，景区要提高重游率，需要找准自己的功能定位。有一些本来是观光游目的地的景区，逐渐转变成了对百姓开放的健身、休闲、休憩和娱乐场所，这些景区不再是作为“游览设施”，而是作为“公共设施”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那么重游率必然很高，即便这些景区也是收一部分门票的，却依然有较高重游率，瘦西湖、天坛都是如此。

国外的典型例子是德国天鹅堡，目前中国人去的很多。研究发现，中国人去一次德国天鹅堡之后，还愿意“故地重游”，去第二次、第三次。原因是天鹅堡非常清晰地定位自己为“文物度假区”，一些游客愿意在度假的时候，再次、再三到访天鹅堡，有的人是每年雷打不动到天鹅堡度假一两次，尽管新天鹅堡每次进入都是要收门票费的。

魏翔认为，提高重游率，也在倒逼景区进行非常清晰的定位。

“景区竞争的过程中，大家都在说，怎么逃脱门票经济，但是你逃脱门票经济这片红海以后，一定要找到自己的一片蓝海，比如说，天鹅堡，没有完全逃离观光区，但把自己定位为一个文物度假区，清晰的定位，使之杀出了红海，重游率自然就高了。”魏翔说。

董观志认为，休闲旅游是观光旅游的升级版，从旅游需求的角度讲，观光旅游往往是长途跋涉，耗时耗力耗经费，一次性消费的概率比较大；休闲

旅游往往是在常住地周边地区活动，付出的时间、精力、经费成本比较少，重复性消费的概率比较大。迪士尼乐园、环球影城、未来世界、草莓公园等世界有名的公园全都做的是重游率，实际上，这就是最近10多年来国内主题公园建设热不断，而且越演越烈的原因所在。旅游景区之后是主题公园，主题公园之后是旅游地产，旅游地产之后是旅游综合体，旅游综合体之后是旅游新区，概念不断翻新，形式层出不穷，关键点只有一个：构建游客重复消费的载体经济。

期待游客反复来，景区的吸引力在哪儿？

一些景区运营人士指出，期待游客反复来消费，旅游载体就必须有足够的吸引力和清晰的感召力。在这方面，一些景区进行了探索和实践。有中国“画里乡村”之称的宏村，近两年江浙沪“三小时经济圈”的回头客增多了，节假日和周末，很多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的客人来附近的民宿小住几日，参加“乡村文化体验游”。

现在，每到采竹笋的时节，很多喜欢吃笋子的游客来到宏村周边的村庄采笋、挖笋，宏村也和周边村庄做了很好的互动，复合型旅游产品不断推出。宏村景区总经理赵波说，宏村的重游率提高，有赖于做好了“传统徽派文化的浸润体验”，并引入了“农业生产体验”。文化型业态、民宿型业态、体验休闲型业态，农业体验型都参与进来，所以宏村才留得住人，也吸引了回头客。

河北白石山为了提高重游率，对于原有的玻璃栈道进行了改造升级、更新换代，把玻璃栈道和音乐、灯光要素结合起来，打造新的亮点，给游客带来新的参与体验，从而吸引回头客。

根据白石山的资源优势，开发出四个季节不同的主打产品，春季踏青赏花、夏季避暑、秋季赏红桦、冬日看雾凇，利用资源的季节特点不断给游客以新鲜感；根据时令节庆来策划参与性强的主题产品，比如清明节万人寻宝、五一黄金周的风车嘉年华、5·20大型表白活动、山顶美食节等等，激发很多游客的参与兴趣，从而提高了景区的重游率。白石山相关负责人介绍，白石山的游客重游率目前已超过20%，在自然风光型景区里算是比较好的成绩。

（记者：张雪松）

云南立法保护澄江化石地

【央广网昆明2017年7月1日】《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世界自然遗产保护条例》（以下简称“条例”）7月1日起正式实施，“无字天书”的保护从此走上法制化轨道。

澄江化石地位于云南省玉溪市澄江县，1984年被中国古生物学家侯先光教授发现。迄今为止已陆续发现并记录近200个物种的珍稀化石，是目前分布最集中、保存最完整、种类最丰富的早寒武纪地球生命大爆发的化石遗迹。该化石地于2012年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中国唯一化石类世界遗产。

《条例》共5章35条，明确了澄江化石地的保护范围、保护原则和保护体制，细化了严格保护与合理利用的措施。《条例》将澄江化石地保护范围分为两级保护区，一级保护区5.12平方公里为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遗产地，二级保护区2.2平方公里为遗产地外围的缓冲区，保护范围总面积7.32平方公里。

为加强对澄江化石地的统一管理，避免多头执法、相互推诿，根据属地管理原则，《条例》明确规定玉溪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澄江化石地管理机构为执法主体，具体负责澄江化石地的保护、管理和利用工作，并具体规定了该机构的工作职责。

此外，《条例》明确规定了澄江化石地保护范围内一级保护区的七项禁止行为和二级保护区的五项禁止行为，强化了对澄江化石地保护范围内违法建设行为、开采磷矿行为和擅自发掘化石等行为的监督和查处。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张德文指出，《条例》的颁布实施，是规范澄江化石地保护管理的需要；是提升公众保护意识，保护遗产地的原生环境，打击盗采化石行为的需要；是履行我国政府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庄严承诺的需要。澄江化石地发现者侯先光教授对于《条例》的颁布实施则给出了“及时”的评价，他提出，7.32平方公里保护范围仅仅是一个量化、具体的标准，应该构建全社会共同爱护、保护化石地的参与机制。

据了解，云南省目前共有五处世界遗产，分别为昆明石林、三江并流、丽江古城、红河哈尼梯田和澄江化石地。此次《条例》颁布实施标志着云南

省五处世界遗产都已制定了地方性法规进行立法保护。

（记者：李腾飞）

龙门石窟成全国首个“无现金景区”

【大豫网2017年7月14日】伴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一个全新的旅游时代正在开启。世界文化遗产龙门石窟景区，成为全国首个“无现金景区”。

走进龙门石窟景区，你的所有体验，都将实现全部智慧化，无现金交易。

购票排队？这早已成为历史。无论你是在凌晨三点，还是在飞驰的高速路上，只要你想到龙门石窟游玩，只要拿起手机，即可实现快速购票，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有人说，看景不如听景？那是因为你欣赏风景的打开方式不正确。走进龙门石窟，打开手机，关于龙门石窟的千年文化故事，都被专业的导游讲解娓娓道来。你想听几遍听几遍，任性随心。

想要合影留念，却不知道最佳拍照地点？不需要四处找人问询，不需要频繁更换角度寻找最佳姿势，只需打开手机，或是轻扫线下二维码，最佳拍摄地点以及姿势的模板图，已经显现出来，它会清晰告诉你最佳的拍照选择以及背后寓意。

当你结束旅行离开龙门石窟，也不需要费心翻遍口袋寻找现金交停车费。轻点手机，便可快速缴费。7月，龙门石窟上线全国首个智慧停车场，轻点手机即可知道景区剩余车位数、实现线上缴纳停车费，无需等待，即开即进、即出即走。

龙门石窟引领旅游迈入智能云时代

景区智慧化建设过程中，游客的每一次点击，都将产生宝贵的数据。这些数据对一个景区或者对一个区域来说是未来管理决策、营销的核心。

但遗憾的是，这些数据，或躺在了冷冰冰的硬件存储设备中，或没有被快速翻译激活，无法产生新的动能。

7月15日，全国首个景区智能云平台将在龙门石窟上线，龙门石窟引领

旅游迈入智能云时代。

龙门石窟大数据平台通过景区线上线下智能化设备的数据接口打通，实现线上、线下更广阔的数据融合与连接，数据来源更深、更广、更宽，形成更加立体化的全域数据，通过海量数据接入，全面提升认知应用，助力智能化景区管理。

从宏观上，龙门石窟不仅可以了解游客的来源地，游客的画像，景区的人流波峰波谷，景区人流密度等，也可以从微观上了解到游客在景区参与的每一项互动体验，通过更有温度的大数据建设，优化景区产品建设感知游客心理，进一步提升景区管理者对游客的认知应用，提高服务水平。

从宏观上，景区不仅可以掌握实时在园人数、游客游览路线，还可以通过线上大数据的抓取，从微观上了解到网友对景区的所知所想，通过情感大数据的建立，读懂景区的网络热词，了解用户，感知用户。

龙门智慧旅游经过三年来的建设，大数据平台的数据来源纬度越来越多，相互验校，更加精准有效。而这些数据，将产生全新动能，助力景区服务管理提升。

意义：智能云平台建立，全面助力文化传播

数字经济时代，云正在成为重要基础设施。6月22日的贵州数博会上，腾讯公司董事会主席马化腾曾说，电带来了上一轮的产业革命，我们认为，新一代信息能源将带来新一轮的产业革命。

目前，龙门石窟智慧旅游平台粉丝共计达到50余万，为游客服务上百万次，共计为游客节约时间980余万小时。

从语音讲解的使用，到全景区微信支付的全面使用，龙门石窟上线产品22种，实现景区无现金交易，全面打通智慧旅游最后一公里，提高游客体验。

“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人们的旅游方式，智慧旅游极大地提升了游客的参与体验度，节约了游客时间，也让旅行可参与，可感知，可互动，可分享。”龙门石窟世界文化遗产园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于迎介绍，通过景区智慧化建设，实现文化惠民，更好地将文物活化，传播中华历史文化。

而智慧化过程中产生的每一个数据，都将成为信息能源，为景区管理提供依据，赋能景区管理。

龙门石窟智能云平台的建立，是景区智慧化建设的再一次创新，通过文智系统的创新应用，解析游客心理，形成用户对龙门的印象关键词；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存储，用人工智能的方式在云端对数据清洗、分析、建模等，让冰冷的数字发出动能，方便景区管理者第一时间掌握景区运营情况，助力景区管理，提升景区认知应用，让景区管理更加有章可循、智慧化。

(<http://henan.qq.com/a/20170714/023591.htm>)

社会纵横

“共享旅行”来了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年7月3日】租赁短期民宿、共享出游攻略、拼团友拼租车、共享帐篷wifi……旅行资源共享、旅行信息共享已渗透到人们旅行的多个环节，像一股清流正在改变旅游业，提升旅游者的旅行体验，改变旅游者的旅行方式，也带来了旅游产业的重构。我们日渐明显地感受到，“共享旅行”时代来了。

共享渗透旅行多要素

随着中国游客旅行经验不断丰富，旅行中的多种需求也在提升。在北京从事媒体行业的王女士，每年都有两次出境游度假计划。她说：“我喜欢自由行，喜欢摄影，把照片分享到朋友圈，所以我每次出国的标配是租wifi设备、海外租车和民宿。现在网上有不少提供共享服务的平台，方便快捷。我的出行体验越来越棒了。”

像王女士这样接受并喜欢共享旅行的游客日渐成为主流。在共享经济为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的背景下，共享旅行已形成并进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共享是将一件物品或者信息的使用权或知情权与其他人共同拥有。共享与旅行的结合可谓珠联璧合，旅行的“吃、住、行、游、购、娱”几个环节都涉及到资源信息的共享和充分利用。共享旅行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现代技术，实现旅游资源和信息的共享，激活并释放闲置资源，给旅游

者的消费观念和旅行方式等带来根本变革。

目前，在旅游住宿和旅游交通领域，共享带来的变化已显而易见。近日，中国旅游研究院和美国知名的短租平台爱彼迎（Airbnb）联合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已经成为海外共享住宿消费重要市场和快速成长型市场。数据显示，自2008年以来有超过530万中国游客预订爱彼迎的住宿。去年中国出境游客预订用户近160万人次，同比增长142%，可见其强劲的增长趋势。共享住宿已成为中国出境游客的主要选择，95%的受访者表示他们曾住过民宿、家庭旅馆、度假租赁房屋等，47%的人住过这样的住宿设施，23%的人认为在境外的时候民宿、家庭旅馆、度假租赁房屋是他们的主要选择，优于酒店的选择。

共享使游客融入当地

一个外国游客这样评价中国的共享单车，“当我骑着共享单车走在北京的胡同，我觉得我像一个北京人。”旅行中的共享理念正在使游客真正融入旅游目的地成为当地人。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在旅游过程当中，游客有分享异地生活方式的权利，有使用共享资源的权利。共享恰恰架起一座本地市民和外来游客共享城乡生活空间的桥梁与纽带。

共享最本质的要素是人。人需要有一个平台一个桥梁，一旦桥梁和平台架设起来，这种交流是很容易的，是超出想象的。在穷游网联合创始人周彤看来，以前的旅行是游客在一旁看风景，虽然看似距离很近，其实跟当地的很多东西是隔着一个看不见的栅栏。而共享旅行则代表着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交流的过程。

共享旅行背景下的旅游者，更加重视与旅游目的地人们的交往，在交通、住宿、导游陪同甚至是餐饮、购物、休闲娱乐等环节与当地居民进行全面接触，获得比传统旅游者更加深入的体验。中国旅游研究院的调查显示，有83%的爱彼迎房客希望在旅游过程中，可以像当地人那样生活。

爱彼迎中国区副总裁安丽告诉记者，爱彼迎不仅仅是酒店和住宿，而是提供了一种文化交流机会，并且是完全当地化的体验和个性化的生活空间。比如游客可以跟着房东去刨地，跟制香师调香水等等。通过交流和住宿分享，游客能够更加真切深入体验目的地的生活。旅游的共享活动让游客和居

民住在一起，玩在一起，聊在一起，通过旅游建立深厚的友谊，能够促进不同国家和地区人民之间的交流。游客或当地居民不经意间互相成为了民间外交家。

共享将重构旅游产业

“共享经济之所以迷人，不仅仅在于它高效的资源共享模式实现了社会资源与需求的良好匹配，同时也在于它人人参与、人人受益、文化共享的独特理念影响了成千上万的用户。这种独特模式和理念，正改变着我们对旅行的认识和实践。”安丽说。

旅游已成为很多中国民众的生活必需品，人们愿意消费高品质的旅游产品。旅游业的综合性产业特征与共享经济的“全民参与、共建共享”理念天然契合，且二者的融合度不断提高。蓬勃发展的共享经济开创了旅游消费新时代，正在引领旅游产业优化升级，并开创旅游产业的新格局。

工信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政策与经济研究所副总工程师何霞认为，旅游的新旧模式会有冲突，但新旧模式处于相互交融的发展。共享旅行新模式的出现意味着旅游市场的规模可能会更大，游客将得到更多元的服务，产生的社会效用更大。

共享住宿已成为主导旅游消费的动机性因素。过去以景区景点为主导，“食、住、行”为支撑的旅游消费模式正在发生根本的变化。戴斌预测说，在大众旅游的新时代，我们站在全域旅游的新方位上，旅游产业的边界实际上正在消失，传统的边界在消失，新的边界正在重构。共享经济正改变旅游要素的组织方式和游客的消费行为习惯，是未来旅游消费的主要趋势。

（记者：赵珊）

时事评论

游客并非多多益善

【经济日报2017年7月4日】暑期将至，故宫博物院近日发布新的客流

“削峰填谷”措施，从今年7月份起将试行全部门票网络预售，并根据试行阶段运行情况，于10月下旬起择机正式实施全网售票，力争在2018年“五一”假期实现观众分时段、错峰参观。

随着旅游业高速发展，故宫及其他优质景区在旅游旺季出现游客爆满现象的事例不在少数。为此，越来越多的景区探索实施门票预约制度，并通过优化游览线路、分流疏导等方式，合理控制游客流量，防范安全事故，提高游览质量。

早在2015年1月份，国家旅游局就下发《景区最大承载量核定导则》，要求各大景区核算出游客最大承载量，并制定相关游客流量控制预案，当年4月1日起实施。实际效果如何，有过小长假出游经验的人都清楚。

究其原因，除了供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恐怕是景区非理性地创收因素所致。不少景区为了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奉行游客多多益善原则，认为多一位游客，不只多一张门票，还要吃喝玩乐行购，游客越多，财源越是滚滚，往往来者不拒。

其实，无论是自然风光景区还是人文历史景区，超载接待对景区本身的破坏力非常大，对广大游客的舒心游览也是不负责任的。长此以往，不仅影响景区的口碑，还会造成游客数量下降，进而影响景区收入。因此，只有保证了旅游质量，游客才会停留下来，充分享受旅游的乐趣，为景区作出更大的经济贡献。

要清醒地认识到，限制流量不是地方政府、景区简单地限定一下人数就万事大吉。这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环保、水利、地质、旅游等方方面面的专业人士，通过科学测量、规划，拿出合理的数据，计算出最佳客流量、最大客流量，景区则需要通过网络票务预约系统，管控好景区的当天售票量、入园人数。当然，流量控制还需要广大游客和旅行社的积极配合，需要社会信息披露机制不断健全。

说到底，解决景区游客爆满问题，还要从景区外着手。一方面，以重点景区为核心，打造一个与旅游相关要素配置完备、能够全面满足游客体验需求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以缓解重点景区接待压力；另一方面，要严格落实带薪休假、错峰出游制度，实现游客、景区、旅游管理部门、地方政府多方共赢。

（作者：郑彬）

乡村游经济，应让村民唱主角

【福建日报2017年7月5日】近年来，乡村游几乎成了各地振兴乡村经济的产业标配。无论是以精准扶贫为目的的地方政府，还是急于寻求投资新风口工商资本的，都对这一新兴领域表现出了浓厚兴趣。去年下半年，国家十二部委联合启动乡村旅游扶贫工程行动计划，全国超过2万个村被列为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其中，福建省分配到472个名额。3月底，福建乡村旅游扶贫“春季攻势”行动在长汀县启动。

回顾国内乡村游并不算长的产业发展史，无可否认的是，其在改造村庄面貌、培育农村产业方面，的确颇有建树。但纵观国内的乡村游案例，唱大戏的更多是行政与资本，本土乡民的角色显得弱化。

回溯各地推行乡村游经济的初衷，除了源自消费理念的革新与市场需求的变化，更多是为了给乡村发展注入新动能，使农民在家门口就能创业就业，让因劳动力转移而出现凋敝的乡村“复活”。此外，本土乡民本身就是乡村游发展中不可或缺的人文资源。数千年来活态传承的人居方式、劳动场景、饮食文化、古法工艺、民俗风情，构成了乡村的独特性格与风貌，是最富有人情味的乡村景观。

一个理想的乡村游发展格局，应当是本土乡民充分认同并积极参与，在与政府、社会资本、游客等角色多元互动的过程中，释放内生动力，复兴乡村经济，实现乡土再造。作为村庄的内生动力，村民在乡村游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然而，不少村民对乡村发展的理念与前景缺乏认同，市场意识尚未觉醒。在发展乡村游的过程中，容易出现剃头挑子一头热的尴尬情景。早前，福建省旅游局在全省确立了11个闽台乡村旅游合作试验基地，并出资聘请台湾专家编制发展规划。当时，台湾乡村旅游协会曾3次到访长泰县陈巷镇山重村与后坊村，计划走村入户，对村庄的资源进行全方位的调查，对村民一对一地进行产业辅导，却因为村民不理解、不配合而难以开展。尽管台湾团队最后还是拿出了一份较有创意的规划书，但因为村民实施意愿低，最终被束之高阁。

此外，即便是有意愿参与乡村游开发的村民，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被

边缘化的困境。近年来，大量工商资本下沉到农村发展乡村游项目，却忽视了开发者与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协调。百姓被从古民居中驱离，无法从旅游开发中获取适当红利，进而滋生矛盾甚至冲突，此类现象并不鲜见。发展乡村游固然需要资本的支持，但乡村游不能简单套用规模经济的逻辑，其背后应有更多社会效益的考量。更何况，原住民的充分参与，确实能成为让乡村游产品更具有人情味、更能打动人心的力量。

因此，发展乡村游，应当理顺政府、企业与本地村民之间的关系，强调后者的主体地位。

作为乡村游经济的引导者、协调者与监管者，地方政府的首要责任在于培育村民的市场意识，激活、培育和保护村民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云霄县和平乡致力于依托当地根基深厚的枇杷产业发展乡村旅游，乡党委书记方艺强描述了这样的场景：“为了招徕潮汕地区的游客，村里一名50多岁的妇女，无师自通地学会了潮汕方言。村民自发地积极开发各类特色产品，薏米水、枇杷叶茶、菊花茶等纷纷出现在游客面前。”对于这样看似粗放实则充满活力的商业形态，即便要考虑将其纳入规范的经营框架，也应充分保护村民原生态的活力。

对于村民发展能力欠缺的现状，云霄县下河乡内龙村的返乡创业者引入了社区营造的经验，同样有启发意义。他们挖掘本村年轻骨干力量，让其在修复家乡土楼、发展生态农业、整治乡村环境、接待国内外志愿者、外出学习、妇女互助创业的过程中，接受新理念，掌握新技能，试水乡村旅游，以期最终带动全村的发展。

拓宽村民在乡村游经济中的参与渠道，同样重要。这个过程中，政府应重在引导社会资本，以项目带动村民致富，促成资本与村民有效互动。南靖县南坑镇新罗村便正在探索村民入股与企业投资相结合的开发方式。按照计划，全村将有超过500人，以古厝、土地等资源要素入股，参与乡村游项目开发。这既有助于提高村民参与度，又能够有效地协调村民与企业的利益关系，保证村民的话语权与收益权，真正实现社会资本抽得回、乡村发展带不走。

需要强调的是，主张村民在乡村游开发中的主体作用，不等同于排斥政府与社会资本参与。缺乏政府的引导与监管，未明晰开发与保护的界限，乡

村游便可能掉入过度商业化、同质化、无序失范的陷阱；缺乏外部资源的导入，乡村游经济将心有余而力不足，推进乏力。

一个理想的乡村游发展路径，应当是以村民自治与参与为核心，多方互动，和谐互馈。

（记者：张辉）

世界遗产

大堡礁幸免“世界濒危遗产”

【中新网2017年7月6日】据澳洲网6日报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世界遗产委员会（World Heritage Committee）5日连夜宣布，澳大利亚大堡礁（Great Barrier Reef）今年再次避免被列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对于这一好消息，澳环境部长弗莱登伯格（Josh Frydenberg）欢呼，这是澳大利亚和特恩布尔政府取得的“巨大胜利”。

大堡礁免被列入濒危遗产

报道称，在当晚宣布这一决定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澳在保护世界上最大珊瑚礁群问题上取得的进步表示欢迎，但也对连续两年发生的大规模珊瑚白化事件表示“严重关切”。

UNESCO指出，如果想要实现长期目标，澳必须加强对大堡礁的保护力度。该组织称：“世界遗产委员会强烈支持澳加强保护力度，确保实现保护计划的中长期目标，这对遗产的整体恢复能力至关重要，尤其是在水质方面。”

据了解，早在2015年，在澳大利亚政府的努力游说下，大堡礁勉强未被列入“濒危遗产”。然而，联合国就这一决定提出了一个条件，即在2016年底之前提交一个进度报告。而大堡礁珊瑚白化事件的愈演愈烈，也加大了大堡礁进入“世界濒危遗产”名录的风险。

环境部长为“巨大胜利”欢呼

世界遗产中心（World Heritage Centre）和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上个月发布的一份研究表明：“气候变化仍然是对该遗产未来发展最大的威胁”。

该研究指出，澳政府为实现水质目标方面进度“缓慢”。澳曾承诺在2025年前减少80%的氮流失以及50%的泥沙流失。分析指出，澳需要开展更多的工作（包括昆州成功通过土地清除法律），来实现政府2050年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澳环境部长弗莱登伯格6日表示，这一决定是世界遗产委员会对澳保护大堡礁工作的肯定。他指出，政府将致力于控制氮流失及泥沙流失，控制荆棘王冠海星的大规模爆发，同时限制清淤。

在被问及是否能够保证大堡礁未来不被列入“濒危遗产”时，弗莱登伯格表示：“世事无绝对。但我们可以说，世界遗产委员会连夜做出的决定是澳大利亚以及特恩布尔政府取得的巨大胜利。”

澳环保政策被批虚伪

据悉，接连不断的白化事件，以及突破记录的水温上涨，已经影响了2/3的标志性珊瑚礁，其中还包括了主要旅游景区的珊瑚礁。

绿色和平组织（Greenpeace）表示，澳政府虽然避免了大堡礁被列入“濒危遗产”的尴尬，但澳大利亚人仍会认为他们在环保政策上十分“虚伪”。组织活动者埃尔斯特（Alix Foster Vander Elst）说：“政府说一套，但做又是另一套。”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7/07-06/8270808.shtml>）

世界遗产申报谁说了算

【中国青年报2017年7月5日】最近几年，时不时会看到某地准备申报世界遗产的新闻。“世界遗产”这个概念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生活中。不过，世界遗产究竟是怎么选出的？世界遗产的评选，最终是谁说了算？在这里，我们需要厘清一些概念，澄清一些误解。

广义上的“世界遗产”，指的是三类项目的统称，即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记忆遗产，它们都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旗下

的项目。其中，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的历史最长，可上溯到1972年的《世界遗产公约》，后两项遗产，都是在前者取得成功的背景下，为保护更多类型的历史遗产而设立的。

狭义上的“世界遗产”，指的就是文化与自然遗产。由于不同类型的遗产业务主管部门不同，我们今天仅以国家文物局负责的世界文化遗产为例，讲述一下基本的情况。

怎样才能申遗成功呢？这是一个极为复杂和极其艰苦的过程，要经过若干个阶段。首先是“预备名录”阶段，即某项遗产如果被认为具有申报的潜力，当地政府可以委托专业机构对其进行评估，制定申报策略，开展文物保护、管理机构设置、环境整治等工作，然后向国家文物局申报进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录”。只有进入到这个预备名录，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中心正式备案后，才算真正具有了“申遗”资格，获得了入场券。

进入到“预备名录”后，遗产地要继续在申遗文本、文物保护、管理规划、遗产监测、公众参与等方面深化，首先要自身准备完全成熟，然后还要等待国家的统一部署。每年每个国家可以申报的遗产数量是——最多1项，而目前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录中的遗产地有61个！也就是说，就算从现在起没有新的项目，也要一个甲子，才能把现有预备名录上的备选文化遗产全部列入。

这么一看，一项遗产，要按照正式流程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这还是考虑到每项遗产都能一次通过的情况。实际上，更大的挑战，在于评审过程中的不确定性。

有些人认为，只要某些国际组织的官员或是国际知名专家认可了一项遗产，该遗产下面需要做的，就是等待时机进入名录了。实则不然，评选世界遗产，除了世界遗产委员会的21个委员国之外，其他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没有绝对的话语权。

世界遗产委员会，由21个国家构成。这21个国家，每两年更换7个。每个委员国最长连续任职不能超过6年。不过现在为了让更多国家参与，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是每个国家最长连续4年担任委员国。在每年的“世界遗产委员会年度会议”（即惯称的“世界遗产大会”）上，21个委员国就申报的新

项目、已有项目的保存状况、濒危名录的更新以及其他议程进行为期十天左右的讨论。如果出现严重分歧，将采用投票方式进行决策。

委员会评价一项申报的文化遗产时，要参考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的专业评估意见。ICOMOS是文化遗产领域权威的跨国专业组织，它的非政府组织的角色，使其具有相对而独立和公正的色彩，也成为世界文化遗产评审中最重要的咨询机构。

每年秋天，ICOMOS都要派遣专家，赴申报遗产的国家，对第二年要进行评议的遗产地进行评估，对其价值和保护管理状况进行详细考察，并形成评估报告，供世界遗产委员会参考。我们经常听到的“申遗现场考察”，指的就是这次考察。

不过，ICOMOS的意见，只是给21个委员国“参考”，并不是说这些意见就是最后的决定。尤其是近年来，委员国最后的决议，与ICOMOS意见不一致的情况越来越多。因此，即使是再大牌的国际专家，也不可能提前断定某项遗产肯定能够列入名录，同样，他们也没有资格断定某项遗产肯定会失败。

总结起来，世界文化遗产申报大体上需要经历列入预备名录、完成申报文件、成为候选项目、迎接国际专业机构考察、接受委员国评估等几个步骤，而中间还涉及很多琐碎的流程。大多时候，一项遗产从提议申报，到最终成功，至少要经历十几年的时光，有的甚至贯穿了某些申遗工作者的整个职业生涯。

所以，如果看到某地请了几个专家，评点几句遗产价值，然后大张旗鼓标榜自己申遗眼看就要成功，你不必太过在意，其实，差得还很远呢。

回顾了这些之后，我们才明白，申遗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也不是某一两个人说了算的。世界遗产的最初目的，是保护人类共有的文明遗迹。联想到近些年愈演愈烈的申遗热，有些地方投入大量财力、物力和人力进行申遗，甚至为自己设定极为明确的申遗时间表，这既不符合世界遗产的初衷，也不符合世界遗产的评审规则。

申遗热应该降温了。降温，先从真正理解世界遗产的意义和申报规则开始吧。

（燕海鸣）

战后重生的卢旺达国家公园

【新华网2017年7月15日】车轮辗过，卢旺达阿卡盖拉国家公园的土路上扬起一阵红沙，站在路中间的斑马匆忙跑进两旁浓密的树丛，几只狒狒依然不急不忙地互相搔着皮毛。

“从公园南部入口驶往动物相对密集的北部大概需要4个小时，狮子大多生活在平原，犀牛则在南部，这里还有湖泊，里面有许多河马，沿着水边的路走，看到动物的概率会大些。”7月中旬的一天，公园向导手指着公园地图向游客介绍着。

建于1934年的阿卡盖拉国家公园是卢旺达唯一的热带草原保护区，公园内有丘陵、平原和湖泊等多种地貌，生活着8000多头大型哺乳动物和约500种鸟类，同时也是一些珍稀物种的家园。

然而在上世纪90年代，阿卡盖拉国家公园受到卢旺达大屠杀波及，公园环境遭到破坏，大量野生动植物死亡。

1994年4月6日，卢旺达时任总统、胡图族人朱韦纳尔·哈比亚利马纳乘坐的飞机在卢首都基加利上空被击落，成为卢旺达大屠杀导火索，持续3个月的屠杀导致约100万图西族和温和派胡图族人死亡。

大屠杀结束后，内战平息，重返卢旺达的难民占据公园大量土地，原本占卢旺达全国面积约十分之一的阿卡盖拉国家公园面积减少一半多，从原来的2500平方公里减至约1100平方公里。回归的难民为保护庄稼驱逐并猎杀狮子，使狮子最终消失。

据媒体报道，卢旺达境内狮子数量曾一度达到230头，但到2000年前后，卢旺达最后一只狮子被杀，在接下来长达10多年的时间里卢旺达再也没有发现过狮子，直至2015年从南非引进。“最后三头狮子是被毒死的，太令人难过了。”兽医托尼说，他依然保存着那些狮子的照片。

上世纪70年代，阿卡盖拉国家公园生活着超过50头东非黑犀牛，由于生态破坏和盗猎等原因，东非黑犀牛数量减少。2007年，东非黑犀牛最后一次

在卢旺达出现。今年5月，卢旺达从南非引进20头东非黑犀牛，才使犀牛重回卢旺达。

卢旺达财政与经济计划部长克拉韦尔·加泰特今年6月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卢旺达大屠杀破坏了卢旺达社会和经济基础设施，造成经济衰退，卢旺达为重建作了许多努力，并取得成效，1995年以来，卢旺达年均经济增长率超过8%。

伴随着国家重建，卢旺达政府也开始恢复阿卡盖拉国家公园，采取措施提振旅游业，改善公园生态系统。2010年起，卢旺达发展委员会和非营利性保护组织“非洲公园”开始共同管理公园，调整公园执法队伍，减少盗猎发生。据卢旺达发展委员会2015年发布的数据，近年来阿卡盖拉国家公园的动物数量大幅增加，每年接待游客2.8万人次，是卢旺达接待游客数量最多的国家公园。

夕阳西下，余晖倒映在阿卡盖拉湖面，数量繁多的水鸟立在岸边枝头，不时掠过水面，又倏尔飞回枝上。“看，非洲的夕阳多美啊，你们回去一定要上网给阿卡盖拉点赞，让朋友们都来看看。”向导罗伯茨对游客说。

（记者：吕天然）

马丘比丘推行限时游览

【界面新闻2017年6月26日】为了控制游客数量，秘鲁文化部上周宣布将在马丘比丘遗迹进行限流措施。

从7月1日起，游客需提前通过旅行社或马丘比丘景区官网订票；且每天只有早上6点至中午、中午至下午5点半这两个时段可以游览，如果想全天在景区城堡中度过，则需要购买两张票；此外，游览时必须有景区导游或执照导游陪同；团体游客数量将被限制在16人以内，且每位游客必须登记身份。

在这些规定正式实施之前，游客只需预订门票，游览并无时限。已预订门票旅客在今年12月之前都可无时限游览。

游客数量过多使得马丘比丘成为了旅游业限流方面的反面教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针对这一问题也一再催促整改。仅2016年前7个月，游客数量便达到了79万人次，比2015年同期增长12%。拉美奢侈旅游预订网站Bespoke

Latin America总监Kirsty Williams认为，新规定的实施的确少了很多弹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它们会带来积极的影响，且最终会达到保护遗迹的目的。

其实早在2014年，秘鲁已加强了对马丘比丘的监管。那时，经常有游客在景区内的印加小径上作出不文明行为，不得已之下，景区无奈将部分行为过激的游客告上法庭，以示严肃态度。

在曾被景区“抓到”不文明行为的游客中，有些人裸体，有些则呼朋唤友一起裸奔，甚至有人把视频传到网上，引起一大波人跟风。于是，不堪其扰的马丘比丘于当年便告知游客，未来将限流且控制参观时间。三年后，这些措施终于尘埃落定。

建于公元1500年的马丘比丘是世界新七大奇迹之一，于1983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为数不多的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作为印加古国曾经的政治和商业中心，这里修建了四通八达的“印加古道”。沿着古道行进，可以走过无数悬空吊桥、木桥，或是隧道，也有机会一探原始森林内与世隔绝的印第安部落，或是有幸瞻望众多神像。现代文明仿佛从未将这里同化，而游客的文明也在这里不自觉地丢掉了。

(加琳玮)

编 辑：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中国风景名胜》编辑部

网 址：www.china-npa.org E-mail：china_fjms@163.net

电 话：010-88315330 88315324 传 真：010-88315325 (F)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7号新疆大厦B座11层

联系人：张 立 陈 晨 邮 编：100044
